

目 錄

“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文化交流 ——以伊索寓言的譯介為例.....	內田慶市	1
《科技術語研究》創刊 與 Virtual reality 的翻譯.....	本刊	10
漢英詞書曲解曲譯例說.....	陳中繩	11
也談“過渡詞”.....	黃河清	17
讀“新國際共通語詞典的設想”一文有感.....	電E文	18
millennium 可譯為“千紀”.....	史光筠	19
“行政長官”二嘆.....	姜玉星	20
翰林建制始終、古“學士”古“博士”的學力地位 及古今系統對應問題.....	姜玉星	21
說“搞”.....	徐時儀	27
字詞雜記（馱、糶、發、發、布草、皮草）.....	周志鋒	33
“婦人”亦稱未嫁女.....	朱承平	35
“龜”和“龜”.....	費錦昌	36
也談“比數”.....	鄧聲國	37
“掇才”並非“免職”.....	王 鏌	38
“酷”詞義演變何悲哀之有？——兼說 語言詞義與言語詞義.....	程觀林	39
關於“剽”字的再討論.....	汪化雲、趙運普	42
〈“一 mār”補議〉質疑.....	黃今許	44
關於辭書選收外國漢字問題.....	胡新化	46
詞語散記（刻、分、大斤、小斤、熊貓）.....	姚德懷	49
“植物名稱庫”詞條選刊(16) —— 無花果、榕樹、油橄欖.....		51
“漢語外來概念詞詞庫”詞條選刊(20) —— 善終服務、拉丁、木乃伊、獾加波、螺旋、郵票、蓄電池		53
本刊增設注音漢文附刊.....	本刊	58
討論（姚德懷，15、39、48） 出版消息（9）		

“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文化交流

—以伊索寓言的譯介為例

內田慶市

0. 前言

我近年來主要研究“西學東漸”與語言的關係，特別是近代中國人在“西學東漸”這個大潮流中怎樣接受“新生事物（=歐美的以科學技術為其中心的近代文化）”，怎樣把這個“新生事物”容納上自己的語言裏。換句話說，就是近代中國人怎樣把“新的概念”反映在自己的語言裏，怎樣創造“新的詞匯”。

這個時代的詞匯跟其以前和以後的詞匯比較起來，確實是劃時代的。現代漢語裏面的許多表達抽象概念的詞匯，如哲學、科學方面的詞匯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詞匯的基礎上發展、穩定的。

1. “西學東漸”的主要旗手—近代來華傳教士

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的具體的現象表現在有關近代歐洲的科學技術的書籍的翻譯、出版事業。這個翻譯、出版事業的主要旗手就是來華傳教士。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的翻譯、出版事業是隨著基督教的傳來開始的。當然他們在近代中國的教育、醫療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主要目的就在傳教，但是他們爲了這個目的，要用很熱情的、無私的精神來闖過語言、文化習慣的障礙，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把西洋的文化傳達給中國人。

這個時代的傳教士既是傳教士，又是優秀的語言學者。他們的主要著作除了《漢譯聖經》以外，還有英漢漢英字典、漢語課本、漢語語法書等等。他們的漢語水平相當高，相當可靠，特別要指出的是，因爲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漢語的對照，用外國人的觀點來客觀地描寫漢語的現象。從他們的著作裏面可以看到本國人不能發現（就是本國人算成理所當然）的各種漢語特徵的描寫。（參看 內田慶市 1991。）

中國的有系統的語法書是1898年出版的《馬氏文通》，但是他們在此之前早就建立了漢語語法理論，如馬禮遜的漢語語法書。他們又已經注意到“官話”有“北官話”和“南官話”、“西南官話”等的區別。比方說羅伯聃的《意拾喻言》的序言裏明確地提到官話的區別，還有文體的區別。他的區別影響到以後的其它外國人的著作，如衛三畏、艾約瑟、狄考文等等。還有他們除了使用漢字以外，還用羅馬字標音，這是對於漢語語音史或者漢語方言研究是很有用處的。

2. 傳教士的翻譯觀——馬禮遜的翻譯觀和《伊索》的東傳

從現象來看，“翻譯”是把別的语言的詞匯代替自己的语言裏的詞匯。

語言跟別的表现，比如音樂、繪畫等一樣都是人的表现之一。語言的背景應該有人（說話者）的存在，這是不可缺的。某個语言的詞匯就是使用這個语言的民族的“認識”的集合。換句話說，語言就是人的認識的表現，是反映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的東西，又可以說語言就是文化。

如果把語言看成這樣的東西，翻譯不是上述的那樣簡單的。

在這樣的語言觀的立場上來看，翻譯不是單純的詞匯的代替。翻譯的“等價”不是看得見的“形式”，而是看不見的“價值”，這個價值是把某個民族的“思維”、“文化”集合或者抽象的東西。翻譯這時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也成為文化的問題，又是文化接受的態度、方法的問題。

近代來華的傳教士他們認真地專心地從事這個工作。他們把聖經翻成漢語的時候，對譯詞的問題很拘泥，很講究。比方說“神”和“上帝”的問題，或者用什麼文體（比如：文理、淺文理、白話、方言）來翻譯的問題等等。可參閱《傳教士大會記錄（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50）》。

《聖經》裏面有“麵包”、“葡萄酒”的概念，但是他們沒有使用這樣的詞匯（雖然這樣的詞匯那個時期已經存在的），而用了“餅”或“酒”等詞匯。他們為什麼沒使用“麵包”或“葡萄酒”呢？這些問題，應該理解傳教士的翻譯觀，才能解決。特別要指出的是馬禮遜的翻譯觀。

2-1 馬禮遜的翻譯觀

馬禮遜的翻譯觀表現在《英華字典》（1815-1823）的序言裏面。他的基本態度或者前提是這樣：

a：對方（就是中國）是異質的文明。

這不是侵略者的態度。他確認對方也有他自己的文明。

b：譯詞應該考慮到他的語言（就是漢語）裏使用時的意思。

這是對於對方的語言的“謙虛”的態度，就是考慮到在對方的文明裏的意思。

總而言之，馬禮遜的對翻譯的態度和方法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強迫對方接受的，而是盡量把自己靠攏到或者同化為對方的文化、思維方式的。

他按照這樣的態度來採用的“奇怪的文理（=淺文理）”就是“神天聖書”的文體。他的《神天聖書》的文體的特徵如下面：

- (1) 多用連詞、代詞。
- (2) 多用量詞。
- (3) 使用時態助詞“了”、“著”、“過”。
- (4) 多用白話的介詞。
- (5) 使用可能補語、趨向動詞。

這就像是《三國志演義》那樣的又“達”又“雅”的文體。但是這些翻譯觀大概不是馬禮遜獨有的，而是應該看成已經從利瑪竇等明代來華傳教士開始的。

2-2 《伊索》東傳

在中國第一次把《伊索寓言》翻成漢語的是利瑪竇。他的《畸人十篇》(1608)裏有七則引自伊索的寓言。他把伊索翻成“厄瓊伯”。

西班牙的傳教士龐迪我也在他的《七克》(1614)裏引用七個伊索寓言。

專門把伊索寓言翻成漢語的是法國的傳教士金尼閣的《況義》。這本書，按照高第的書目等是1625年在西安出版的。但是刊本到現在還沒有發現，只有四種手抄本。其中三種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另外一種在倫敦大學圖書館。寓言都有三十六個。

這三個傳教士的伊索大概是後人參考了前人的翻譯。特別是金尼閣的《況義》明顯地襲用了龐迪我的翻譯，如下：

寓言曰，烏栖樹啄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為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為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為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為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卷一伏傲篇，戒聽譽 21b-22a)

烏棲枝啄肉。狐欲奪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是堪為百鳥王。但未聞聲何如。烏大喜。嚙然而鳴。肉下墜。狐遂得肉。義曰。人面諛己。必有以也。匪受其欺。實受其愚。(況義 9)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眾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即鷹鷲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眾兔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卷四 熄忿篇 23a)

獸中兔膽最小。一日眾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即鷹鷲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若死。死而懼止矣。相向往湖中。將溺死。湖岸有蛙。見兔。駭亂入水。前兔遽視。眾兔曰。止。止。尚有怖過我者。義曰。有生者。夫各有所制矣。毋自惑也。雖然。不憂不懼。豈為能制人。(況義 22)

一賢寓言曰，獅子為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諛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獅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于大王疾

何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即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愛，既其女遠。(卷六平妒篇 戒讒言 10b-11a)

獅子為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候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我輩皆來。狐獨否，誠欺王。狐適至聞之。便進問。獅子大怒，詰後至者何。狐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候安。於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幸得。趨前。何敢後。獅子更大喜。詢何藥也。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被大王體。立愈矣。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義曰。讒人之言。甫脫於口。剝膚之慘。旋羅躬。可畏哉。(況義 8)

當時傳教士來華的時候如下面的裴化行的記述那樣都帶《伊索寓言》，做為他們傳教的幫助。還有那個文體也跟一般的文言不一樣，就是儘量容易了解而且不俗的文體。

有位官員見了有這種畫的一本關於救世主的小冊子，愛之若狂，我表示歉意：這是我教的書，不能送給他，……他只好接受《伊索寓言》算了，把它居然當作弗蘭德你印刷精品。(裴化行著《利瑪竇評傳》(管震湖譯 商務印書館1993 上冊214p)

後來1840年出現了《意拾喻言》。這是英國人羅伯聃(Robert Thom)翻譯的。

《意拾喻言》原來1838年到1839年曾在澳門以《意拾秘傳》的書名出版過。1840年在廣東出版的《意拾喻言》有八十二則，英漢對照，還有南京音和廣東音的標音，而1838-1839的只有漢語而且七十七則寓言。這個伊索出版的主要目的跟以前的有點兒不同，就是為了學習漢語或者學習英文的。伊索寓言以後經常這樣做為課本來使用，如下：

西元1864年1月、韋確士(E.J.R. Willcocks)從英國到港任中央書院英文教員、於西元1865年、將英文科變為必修科、第一班(Class 1)的翻譯科、要求學生將伊索寓言及孟子翻譯為英文。(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26p 中國學社 民國64年3月。編注：舊制 Class I 即今之中學六年級。)

《意拾喻言》後來在《遐邇貫珍》《小孩月報》等報刊上連載過，還有以《伊娑菩喻言》的書名在香港(英華書院和文裕堂)和上海(大概在墨海書館或者仁濟醫院)出版過，又傳到日本出版。

《伊娑菩喻言》也許經過麥都思等的改編。因為《遐邇貫珍》上轉載的時候被改為《伊娑菩喻言》(《遐邇貫珍》第一號)，還有《伊娑菩》這個語音不是按照廣東音，是反映沒有“入聲字”的地方的語音。

日本江戶時代末期(1862年)，江戶幕府派遣高杉晉作等到達上海。那時高杉等拜訪麥都思那裏買回各種書籍，比如《數學啓蒙》、《代數學》、《地理全志》、《聯邦志略》、《新約全書》、《六合叢談》，還有《伊娑菩喻言》等等。

這個《意拾喻言》的語言、文體很有特色，基本上跟《神天聖書》一類的特徵一樣。一部分是文雅，一部分又是白話，正是半文半白的文體。

特別有趣的是每個故事的開頭部分，還有最後的教訓部分。

比方說，《兔子和龜》的開頭部分這樣開始：“禹疏九河之時”。別的故事也一般都變成中國式的，比如“盤古中”、“山海經載”、“大禹時”、“神農間”、“羅浮山下蘭若幽樓”、“峨眉山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無稽村外”等等。教訓部分也是這樣，如“漁人得利”、“論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江山易改，性格難移”、“經一事，長一智”、“助虎添翼”等等。

有西洋的人物也改成中國人，如把“Diana”翻成“嫦娥”，“Hercules”翻成“阿彌陀佛”，“Jupiter”翻成“北帝”等等。

這個《意拾》的翻譯方法可以說是反映了有意志地把自己同化為中國文化的傾向。這個《伊索》跟中國人翻譯的《伊索》（比如，張赤山的《海國妙喻》或者林紓的《伊索寓言》）有所不同。

《海國妙喻》（1888）沿用《意拾》，但是比如〈美女〉（《意拾》的〈愚夫癡愛〉）是這樣的：

古時羅馬國廟宇甚夥，有一神名維納斯者……

〈騙狼〉（=狼受犬騙）也這樣：

印度山麓蘭若幽樓，小犬守於門外……

可見《海國妙喻》儘量排除中國化。

林紓的《伊索寓言》（1903）可以說是林紓通過伊索表現自己的對當時的情況的意見或者建議。文體也是傳統的古文。但是裏面也有新詞，如“團體”“行政”“劇場”“市場”等等。這大概受了嚴復的影響。因為林紓的伊索的實際上的翻譯者是嚴復的兒子和侄子。

鍾天緯編的《讀書樂》（1898年 上海三等學堂譯編 上海美華書館）的第二卷也以《意拾喻言》為藍本。還有《孩訓喻說》（1900 上海廣學會）也是《意拾喻言》的系統。

我們關西大學增田文庫裏收藏有很多這個時代的“西學東漸”方面的書籍，有一本書叫《東方伊朔》。

這是1906年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由中國人傳教士陳春生編的。這個《伊索》全部都是中國的故事，有時引用《聖經》的故事。裏面有“留聲機”、“鐵路”、“德律風”、“照像法”、“電報”、“透物光”等詞語。我認為這個《伊索》是馬禮遜的翻譯觀的終點，就是馬禮遜翻譯觀的“升華”。這是傳教士的有意志的有自覺的“自己同化”的完結。這樣的傳教士的態度正是給中國人留下了基督教的深刻的影響。

關於伊索的東傳，我最後提出兩個有趣的問題。

(1) 《況義》以前已經存在另外伊索中文翻譯本的可能性

天主教士到外國傳教時，比如拿日本來說，他們把《聖教要理》和《伊索》翻成日文。最早的翻譯本是1593年。中文的《聖教要理》也是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過。那麼《伊索寓言》也許在同時出版過。

(2) 中國的寓言“西傳”的可能性

伊索寓言裏有一些跟中國古代的寓言相似的故事。那典型的例子是〈東木譬喻〉。這個故事和中國的“吐谷渾阿柴”（《魏書》或者《三十二國春秋》）的故事完全一樣。還有《元朝秘史》裏面也有。我看來這個現象不是偶然的。哪個故事早哪個故事晚？也有可能從中國傳到歐洲。

3. 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資料

“西學東漸”與言語的關係最鮮明地表現在“專門用語”上。比如“科學技術”方面的詞匯、地理用語、數學、物理、化學等詞匯。這些都是原來中國沒有的，隨著“西學東漸”從歐洲傳來了“新生事物”，而且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最需要的東西，所以要創造新的詞匯。我最近認為進行這樣的詞匯的演變時應該考慮到天主教的傳教士的用語和新教的繼承關係。又認為要弄清楚同一個人也有時候用語不一樣的現象。如艾儒略的“冷帶”和“寒帶”是一個例子。他的《職方外紀》的用語和《西方答問》的有所不同。

“西學東漸”還帶來了很多新的日常用品，如食品、交通工具、藥材、首飾、衣服、房什等等。

關於“專門用語”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成果，如沈國威先生的一系列著作、荒川清秀先生的地理學用語的研究等等。但是相對來說，日常用語的研究好像不太多。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這個“日常用語（常用語）”方面詞匯的演變（誕生、變化、發展）。

“日常用語”跟“專門用語”比較起來，相當“保守”的，不容易弄清其變化。但是荀子說過“名也者，所以期異實也”。這個時代傳來的“日常用品”等也有一定的新的名稱，肯定有一定的特徵。

對這個方面的研究有益的資料如下面幾種：

(1) 《漢譯聖經》

我們要提到的不是有關宗教的專門用語，而是《聖經》裏面的很多日常語，如“餅”、“酒”、“黃油”之類的東西。拿一個例子，《古新聖經問答》（1862）裏有一個“火車”這個詞匯。

“如厄里亞，為罰惡人，祈求天主，三年半不下雨，還行許多奇妙的大聖跡，後來坐一火車，登空而去”（第十一段）

這個“火車”當然不是現在的“火車”，但是“火車”這個詞匯確實這個時代已經存在的。

《漢譯聖經》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可以用來鑑定“非日語借詞”的。因為《漢譯聖經》一般來說沒有日語的影響，專門給日語予影響。如“自由”這個詞匯已經在麥都思的聖經裏，所以這不是日語的借詞。

(2) 英語課本（英語詞匯·會話集）

清末出現了一些英語課本，如《華英通用雜話》（羅伯聃1843）、《增訂華英通語》（這是1860年由日本福澤諭吉增訂的，原本卻是1855年前後由廣東人子卿編的）、《英語注解》（1860年前後，馮對山等編的）、《英語集全》（1862，唐廷樞）、《英字入門》（1874，曹驥）、《英字指南》（1879，楊勛）等等。

關於這些英語課本的重要性，周振鶴先生也曾經提過（1996）。

這些都是相互影響的，體裁也差不多。英文用漢字標音，詞匯有分類，所收的詞匯大部分是貿易方面的，比較常用的詞匯。這些課本都用〔a（英語）是b（漢語）〕這樣的解釋法，這個b（漢語）應該是眾人所周知的詞匯，又是比較固定的詞匯。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課本裏頭看到一些詞匯的演變，如“黑茶”到“紅茶”（參看 內田慶市 1998b），“通事”到“翻譯”等。只是要注意這些課本都是依靠“南方方音”、“南方方言”寫出來的。如《華英通用雜話》說明這是用“正音”來注音，但是當時的“正音”不是“北京官話”，是以“南京方音”為主的“南方音”，如用“士”來表示“s”，用“及”表示“k”，“生”來表示“sun”，“英弟也”來表示“india”等等。語法、詞匯上面也有一些南方方言的特徵，比如“洗面盤”、“照面鏡”、“曉得”、“剃髮刀”。

這些課本出版的時期都是1840年代到1880年左右，這個時期正是日語的影響比較稀薄的時期，所以我們又可以把這些資料用為鑑定非日語的一個標準。

(3) 英漢·漢英字典之類

英漢·漢英字典的重要性不須說的，馬禮遜、麥都思、衛三畏、羅存德等外國人編的字典當然要使用。我們還要看中國人編的字典，特別是“商務印書館”的一系列英漢字典很重要。我們從中國人編的字典裏面可以看到中國人怎樣接受新的詞匯，怎樣排除新的詞匯，怎樣固定新的詞匯這樣的過程。

商務印書館的第一部漢英字典是1899年出版的《商務書館華英字典》（按照鄺其照的《華英字典集成》）。然後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漢英字典。

這個時期正是遇上漢語開始受日語影響的時期。

這些字典裏，除了鄺其照的字典以外，還有《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1902）、《英華大詞典》（顏惠慶1908）、《綜合英漢詞典》（1927）這三種是比較重要的。

鄺其照的字典大概受到麥都思的字典的影響。《華英音韻字典》根據羅存德的字典編的，但是還有納韜耳、韋氏和一些日本字典的影響，《英漢大詞典》也有納韜耳、韋氏和日本的影響。

《綜合》又是一本劃時代的字典。以前的一般都是以韋氏爲主的，但是《綜合》除韋氏以外還參考牛津、Century、Standard、日本各種詞典而綜合衆長，所以起名叫《綜合》。

我曾經籠統地調查過一些詞匯。（參看 內田慶市1995b,1998a）

我們可以某個程度上確認沈國威先生以前說過的“英漢字典”和《漢語外來詞詞典》認定的日語借詞之間的差異。沈（1994）的差異是如下：

- (a) 日語的譯詞和羅存德的一致的；
- (b) 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有些關係的；
- (c) 跟日語的譯詞沒有關係的。

我們可以看到(a)類比較穩定，其他也有一些漸漸地受日語的影響，然後有的詞匯在漢語裏面固定，有的詞匯被淘汰的過程。

現在舉一個有興趣的例子。“自行車”這個詞匯沒有出現在商務的字典裏。這個時代已經有自行車這個交通工具，如在《滬游雜記》（光緒二年）等有自行車的記述，但是直到1936年的商務字典也沒有收進這個詞匯。“自行車”早就出現在《諸器圖說》裏面，但那個“自行車”是“自動行路的車”（今天的汽車）的意思。《綜合》裏有“自轉車”。這是《綜合》受到日語的影響的結果。

(4) 報刊、旅遊記、出使記，條約集等

華字報紙（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遐邇貫珍》、《察世俗》、《六合叢談》等），中國人的外國旅遊記、出使記，還有條約集、貿易記錄等也是可供研究的資料。如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等很有價值。這裏面有很多萬國賽會出品東西的詞匯等，我們從那兒看出新的詞匯。

除了上邊說的資料以外，還有外國人學漢語的漢語課本、翻譯書之類也當然很有用處的。

最後我想提到日本學者很早以前重視這個方面的研究。比如魚返善雄1941年早就指出應該重視外國人的漢語研究，太田辰夫也在1951年寫的《關於清代的北京語》裏用過很多所謂“歐文資料”（他已經在這個論文裏說到羅伯聃的著作）。

我們以後要繼承前人的成果，在這個前人的基礎上更加發展這個方面的研究。但是資料很多，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應該要跟同行進行共同研究。

<參考文獻>

沈國威 1994 《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笠間書院）

熊月之 1994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田慶市 1991 <《華語拼字妙法》的音系—南京官音的一斑>（《中文集刊》第3號）

—— 1992 <“官話”研究的《漢譯聖經》的可能性>（《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41卷-第3號）

—— 1993 <《漢譯聖經》的可能性>（《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報》第56號）

- 1994 <伊索東漸>(《泊園》33號)
 - 1995a <伊索東漸補遺>(《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17號)
 - 1995b <商務印書館《英華字典》的系譜>(《關西大學文學論集》44卷—第1-4號)
 - 1995c <從歐洲開—經過日本—開往中國>(《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報》第61號)
 - 1997a <從歐洲開—經過日本—開往中國“西學東漸”的另外一條路程>(《浙江與日本》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國際共同研究叢書1)
 - 1997b <清國英語事始>(《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18號)
 - 1998a <關於鄧其照的《華英字典集成》>(《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19號)
 - 1998b <從“黑茶”到“紅茶”>(《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31號)
- 周振鶴 1996 <鬼話·華英通語及其他>(《讀書》3) □

〔日本國 大阪府 關西大學文學部〕

〔編者附記：今年3月，內田教授由波士頓回國途中，應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邀請，訪問了該會，並於3月9日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作了演講。本文是這次演講的底稿。〕

本文最早的文本曾在下列場合宣讀過：(1)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的“漢字圈近代學術用語的形成和交流 國際學術討論會”(1997年2月20日)；(2) 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西學東漸與語言交流 學術討論會”(1997年8月27日)；並曾以“關於‘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接觸研究的方法”為題在日本《中國學志否號》第21-31頁刊出。本刊現在刊出的是作者的最新修訂本。〕

出版消息

- 黎錦熙撰，黎澤瑜編，《黎錦熙紀事詩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
- 周有光著，《比較文字學初探》，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
- 陳君葆著，謝榮滾編，《水雲樓詩草》，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4年。
-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雲蔚、陳文達、陳雲湘編，
《陳君葆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雲玉、陳雲蔚、陳文達、陳雲湘編，
《陳君葆日記(上)，1933-1940年》，《陳君葆日記(下)，1941-1949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
- 莊澤義著，《提高學生的中文寫作水準》，香港：里波文化創作室，1998年。
(附：莊澤義語文編著總目。)
- 張勵妍、倪列懷編著，《港式廣州話詞典》，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1999年。